



Academic Series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选择战争：基于规避 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

Choosing War: A Loss-Aversion
Theory of War Decision

● 林民旺 著



世界·中国 出版社

选择战争：基于规避 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

Choosing War:
A Loss-Avers
War Decis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 / 林民旺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12-3809-5

I . ①选… II . ①林… III . ①战争—案例—分析—世界
IV . ①E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1732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陈可望
田 林

书 名

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

Xuanze Zhanzheng: Jiyu Guibi Sunshi de Zhanzheng Juecelilun

作 者

林民旺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65233645 (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20 × 1020毫米 1/16 12½印张

字 数

212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4月第一版 2010年4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809-5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外交学院
“李嘉诚学术基金”资助

总 序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国外大互动。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果说过去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很重视的话，今天则不然，几乎所有的问

题，世人都想了解中国的意见和立场。如何让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就需要了解中、外双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此作出贡献。

“黄金时期”的第二层含义是热情高。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学者，看到了这样一个旺盛的需求，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愿意为满足上述需要贡献自己的才智。

“黄金时期”的第三层含义是影响深。影响深是指在今天中国和世界形势下，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的学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研究的成果是国家所需要的，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世界所需要的。

第二，丛书的出版适应了外交一线的需要。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进入了一个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国无论是在外交理论方面还是在外交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势要求我们对于这些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中国的外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忙碌，外交一线的同志每天都有大量的事要处理，很少有时间对我们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而我们在外交学院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这些同志则不同，我们能够坐下来对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思考和总结。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外交也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处理好这些课题需要好点子，需要一些长远的思考和眼光。此外，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新的概念和理论，都会对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需要我们进行观察和研究。

第三，丛书的出版也是外交学院发展的需要。大学的生命线是教学。外交学院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建新校园，师生的数量都要增加，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学术研究来支撑，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

综上所述，《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是恰逢其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嘉诚先生对外交学院学术研究的大力资助；感谢世界知识

出版社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同时，我还要向为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学院的老师们表示敬意。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反映了本院老师和研究工作者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通过对形势的观察，对问题的研究，进行独立思考所提出来的，都属于个人的看法和见解，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吴建民

2006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

 第二节 已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 4

 第三节 理论建构..... / 12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20

第 1 章 前景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 25

 第一节 前景理论及其核心概念 / 27

 第二节 前景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 / 34

 第三节 前景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 42

 第四节 理论优势及争议 / 54

第 2 章 观众成本与外交决策研究 / 60

 第一节 观众成本：概念及内涵 / 61

 第二节 观众成本影响国际互动：因果机制的分析 / 63

 第三节 观众成本与国际关系研究 / 72

 第四节 观众成本研究的学术争论及其适用性 / 78

第 3 章 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模型 / 83

 第一节 国际危机中的信号传递 / 84

第二节 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模型	94
第三节 变量操作化及几点说明	102
 第4章 三八线的战争	 108
第一节 非本意的战争	109
第二节 越过三八线	117
第三节 跨过鸭绿江：为什么中国出兵朝鲜	127
 结 论	 153
第一节 案例分析及理论检验	154
第二节 理论的政策指导	157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162
 参考文献	 166
后 记	187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941年12月7日早晨7时55分，实力远逊于美国的日本出动了飞机约360架、军舰55艘，连续两次猛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和机场，致使珍珠港内8艘战列舰都失去了战斗力——其中“俄克拉何马”号和“亚利桑那”号被摧毁或击沉。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受到严重损失或被摧毁。2323名美国陆海军人员死亡。^①

60年后的2001年9月11日早晨8时40分（美国时间），19名“基地”组织成员劫持四架美国客运飞机，并用这些飞机对美国最具象征性的目标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攻击。两架飞机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南北两座高楼，让美国公众通过电视目睹了这两座象征美国经济中心建筑物的倒塌过程。第三架飞机则撞上了华盛顿郊外的五角大楼，致使这座象征美国国家军事力量的建筑物遭到部分破坏，并造成建筑物内的人员伤亡。在这场恐怖主义发动的攻击中，总共导致了将近3000人死亡。^②

这两个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外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对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珍珠港事件和

① 刘绪贻、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② 汪波著：《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9·11”事件非比寻常。这不仅是由于它们造成的历史影响，而且还在于它们带给我们的困惑和思考。珍珠港事件是由一个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对拥有绝对实力优势的强国所主动发起的战争，而“9·11”事件则是恐怖组织对一个主权国家发起的“战争”——虽然这种“战争”不同于过去的理解。现实问题的挑战往往推动着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面对层出不穷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时，研究者如果推卸责任，将它们归结为“难以理解”或者“非理性”是不恰当的。对于那些将“自杀性恐怖主义”的原因归结为恐怖分子的“非理性”因素的学者，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批评道：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反常”事例，仅仅将它们发生的原因归结于非理性是远远不够的。^①任何国际问题都有其“合理的”解释。之所以我们认为很多问题“非理性”，那是因为它们挑战了我们原本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将这些令人困惑的事件看做是“正常而合理的”，我们才能“公正、客观”地去探求它们的内在原因。

本研究面对的就是这一类“非正常”事件：为什么两个原本没有战争意图的国家最后走向了战争？为什么实力更弱的国家会主动选择与强国为战？远的例子不说，近代史上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7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起的第三次中东战争、1982年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马岛事件，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罕为人知的国际冲突与战争。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本研究的重心是战争的原因。

战争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的永恒话题。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正是基于对战争原因的探寻。正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所言：“国际关系学中的目的成分，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国际关系学诞生于灾难性的大型战争，驱使和激励这门新学科先驱学者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国际关系中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防止战争的强烈愿望确定了学科整个初始进程和发展方向。”^②战争问

^① Robert A.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pp.8-26.

^② [英]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题也主导着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美国政府支持并投入巨额资金建立了战争相关数据库(COW),美国的一些知名大学也纷纷建立国际冲突与安全研究中心,创办了《冲突解决》、《国际安全》、《安全研究》、《和平研究》等著名刊物,学术界、智库、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都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对战争与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产生的学术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我们对战争的研究是否就令人满意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所说:“不幸的是,我们还不知道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即使我们确实知道了战争的原因,我们也远不能就这些原因达成一致。迄今为止还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冲突和战争理论能为若干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们所接受,或者能够为那些给予社会科学家们以启发的其他领域的权威们所接受。”^①斯蒂芬·范·埃弗拉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令人悲哀的是,学者们在这个问题(战争)上取得的进展寥寥。虽然有大量探讨战争原因的文献问世,但这些文献在如何预防战争的问题上着墨不多。所提到的大多数原因都不具有操作性(例如,人类的本能,各国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性质或是国家间实力的分布)。许多将原因视为可操作的假说并未得到验证,这使得怀疑者很容易就否定它们。因此,这些著作大部分都得不到主流评论家、政策制定者与和平组织的重视。”^②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

(1) 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自然科学是在可控环境中进行研究的,可以对理论假设进行大量、反复的观察和试验。可是,在国际政治(或者说社会世界)中,任何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唯一性。尽管我们可以将人类发生的所有冲突都抽象为“战争”,可是我们仍然无法确定,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假设我们在大量的战争案例中找到了相似性,换言之,在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确立了很高的相关系数,然而,我们仍然无法保证它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②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页。

们之间是否具有因果性，是否存在某种恒定不变的因果律。也许，这种相关性只是虚假的，或者只是由于未知的第三个因素存在才导致的。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2）人类世界的反思性。人是具备反思能力的。我们常常喜欢从历史事件的解读中提取经验，以指导我们的未来行动。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某些事件更容易发生，或者更难以发生，进而就难以确保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保持长期的有效性。例如，英国人从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过于强硬的外交政策容易导致战争。在这样的集体反思之下，欧洲历经了“20年危机”，英国一再采取绥靖政策，滋养了希特勒的扩张野心，也带来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3）人类思维的局限性。对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生而言，最初的学术训练往往都从解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看似纷繁复杂的外交行为背后隐含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雅典力量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导致了战争的不可避免。修昔底德无疑是睿智的。但是，也正是由于前人的学术影响，如建构主义的研究表明的那样，他们的思考理路限制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路径，换言之，我们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历史思维的框定（framing）。

综上，寻求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所有战争是不可行的。对目前人类的智慧和知识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基于此，我们将研究范围限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其中一类战争——不对称战争。同时，最重要的是，为了改变我们理解战争的思维定式，本研究将借鉴社会科学中的最新成果，转变思考战争原因的范式，以寻求增进知识的增量。

第二节 已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关于战争原因的研究数不胜数，几乎囊括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

从戴维·辛格（David Singer）讨论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以来，^① 战争原因的分析沿袭了这种模式。学者一般从五个层次探讨战争原因：体系层次、地区层次、双边层次（dyad）、国家层次和决策层次。由于本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两个原本没有战争意图的国家最后却走向战争，以至于实力较弱的国家主动选择了发动对强国的战争。所以，在已有的理论解释中，我们关注的是关于先发制人战争原因的探讨。这些理论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理性主义的理论；另一类则是心理学的理论。

一、理性主义的解释

（一）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最初是在1958年A. F. K. 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批评汉斯·摩根索的均势理论时提出来的。均势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导致了国家偏好于采取均势行为，以维持国际体系的权力均衡状态。与之不同的是，权力转移理论将国际体系看做是金字塔形的等级制系统，以国家掌握的权力资源进行等级排列。位居金字塔顶端的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dominant power），它有能力在整个国际体系推行某种行为模式（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施加某种秩序。整个国际体系的利益分配体现主导国利益和特权。如果主导国能够保持权力的绝对优势，国际体系将会是稳定的。然而，随着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处于金字塔中层的强国崛起时有力量重塑国际等级制。为了重构国家间的关系规则，以及为了获得主导国所拥有的更大利益和特权，该竞争者就可能成为大战中的进攻者。^②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换过程是否会爆发战争，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1）崛起国与主导国实力上是否接近；（2）崛起国对既

①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Phil Williams, Donald M. Goldstein and Jay M. Shafritz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Thomas Learning, 2003), pp.105-118.

② Jacek Kugler and A.F.K.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ed. Manus I Midlarsk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有国际体系是否满意。据此，可以预测，当崛起国实力将要超过主导国，或者是当两者实力差距缩小，主导国越来越可能为了阻止国际秩序的转换而发动战争，或者崛起国也可能由于担忧主导国的进攻而选择先发制人。换言之，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和主导国都有考虑进行先发制人战争的强烈动机。发生战争的因果机制则是，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崛起国担心主导国可能利用权力优势遏制其进一步崛起，而主导国则担心崛起国可能在实力持平之后颠覆原有的国际体系，推翻主导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对于战争爆发时间的预测，奥根斯基最初认为，不满的崛起国会选择在权力转移之前主动发起战争。在后来的研究中，奥根斯基和杰斯克·库格勒（Jacek Kugler）却认为，战争更多时候是发生在权力转移之后。^① 这一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引发了不少争论，也构成权力转移理论一个尚未解决的理论难题。尽管如此，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认为，对于战争爆发时间的预测并不能证否（falsifiable）权力转移理论，因为战争是否在权力转移之前或者之后爆发，还存在其他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例如风险倾向、国内政治，等等）。^② 总而言之，权力转移理论对于战争爆发的预测是：战争通常发生在崛起国实力接近于或者超过主导国的时间段内。

权力转移理论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权力转移理论是体系层次的战争理论，解释的是一种国际结果（international outcome）。作为体系层次的理论，权力转移理论所表明的是，权力转移和战争爆发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这一理论本身并不解释具体战争的爆发，缺乏对战争爆发原因的微观解释。正如戴维·德斯勒（David Dessler）批评战争相关项目（COW）的研究一样，虽然这种相关性研究能够找到影响战争爆发的因素的作用大小，但是却无法真正找到战争发生的内在机制。^③ 换言之，宏观层次的解释只考虑了影响国家行为的外部结构，却忽略国家行为的能动性。第二，权力转移理

① A.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②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9.

③ David Dessler, "Beyond Correlations: Toward a Causal Theory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3 (Sep., 1991).

论将崛起国是否满意已有国际体系作为解释战争原因的重要变量。事实上,“满意程度”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一理论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测量国家满意度的共有标准,这样也就损害了理论的预测力。第三,权力转移理论没能够解释是谁(崛起国还是主导国)在什么时间里会主动发起战争。在发动战争问题上,这一理论认为,不论是崛起国,还是主导国都有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动机。同样的,对战争爆发时间的预测也是如此:战争既可能在权力持平之前爆发,也可能在崛起国实力超过主导国之后爆发。

(二) 攻防理论

1978年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一文中首先提出攻防理论。随后,这一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的重要理论根源。1998年斯蒂芬·范·埃弗拉发表《战争的原因》一书,代表着这一理论建构的完成。这一理论认为,当攻占比防守容易的时候,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①之所以如此,根据埃弗拉的总结,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十个方面:第一,国家会更多地采取机会主义的扩张政策,因为扩张企图的成功机会更多并获得更多的收益;第二,国家会更多地采取防御性的扩张,因为它们觉得更不安全。由于面对征服显得更为脆弱,它们更期望将其边界扩张到更具防御能力的地方,并使其强大的邻国被削弱;第三,它们更强的不安全感也促使国家以更激烈的方式抵抗别国的扩张行为。他国所获得的权力收益大大增加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它们的扩张行为会激起更为猛烈的反应;第四,抢先行动的利益变大时,会引起先发制人战争的风险以及其他危险;第五,机会窗口和脆弱性窗口变大时,会引起预防性战争的风险和其他危险;第六,国家会更多地采用造成既成事实的外交策略,而且这种策略会更多地引发战争;第七,国家之间的协商变得更不容易,更难实现合作。因此,谈判失败的次数更多,而争端会恶化,变得难以解决;第八,国

^① 邹明皓、李彬:“美国军事转型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74—75页。

家会采取更秘密的方式隐藏其外交和防务政策，增加了军事误判和政治错误的风险；第九，国家对于他国的错误反应更为迅速，并显得更为好战，使得错误变得更为危险；第十，军备竞赛变得更快，而且更难以控制，增加了预防性战争的危险和由于错误的乐观主义而引发战争的风险。^①

与权力转移理论一样，攻防理论也是体系层次的战争理论，同样缺乏对战争微观层次的解释。为了弥补这一点，攻防理论增加了大量的解释性假设，例如错误知觉、不安全感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解释性假设确实增强了攻防理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这样又使得攻防理论的解释力需要依赖大量的外部条件的假定。^②此外，围绕攻防理论的争论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攻防理论的核心自变量——“攻防对比”的界定过于模糊，使得使用和检测该理论缺乏一致性；^③二是攻防对比难以计算，因为战争的结果难以预测，且影响攻防对比的因素，即攻防区别也不甚清晰。^④

（三）战争的预期效用理论

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ueno de Mesquita）借鉴预期效用理论来研究战争决策。根据预期效用理论，弱国对强国发动战争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当预期效用大于成本，弱国也会选择战争。举个例子，在战争前决策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发动战争，要么选择无所作为。当选择发动时，假设只有两种结果：成功或者失败。假定取得成功的概率为 P ，则失败的概率为 $1-P$ 。同样，打赢战争的效用为 X ，失败的效用则为 Y 。那么发动战争的预期效用为 $U1 = XP + Y(1 - P)$ 。

① [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144页。

② 对这一理论的批评，还可参见 Richard Betts, "Must War Find a W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pp.166-198.

③ Jack S. 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8, No.2, 1984, pp.219-238, 转引自邹明皓、李彬：“美国军事转型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77页。

④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4, No.4, 1995, pp.660-691, 转引自邹明皓、李彬：“美国军事转型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77页。